

另册

那些鲁迅骂过和 骂过鲁迅的人

诸荣会 著

「另册」，一是指人一旦注人其中便不得翻身的那个「另册」，
二是指有些人在人生中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页」。

陈西滢 叶灵凤 高长虹 邵洵美 王人美 徐志摩
闻一多 徐悲鸿 李四光 刘文典 梅兰芳 段祺瑞
这些近现代史上众人皆知的人物，究竟与鲁迅有着怎样的恩怨成见？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另册

那些鲁迅骂过和 骂过鲁迅的人

诸荣会一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INDUCTION OF LIPIDATION IN ART PHOSPHOLIPIDS 18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册 : 那些鲁迅骂过和骂过鲁迅的人 / 诸荣会著.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78-4149-8

I. ①另… II. ①诸…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9648号

书 名: 另册——那些鲁迅骂过和骂过鲁迅的人

著 者: 诸荣会

责任编辑: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9.12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149-8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在巴黎	/ 001
咎由自取之外	/ 017
只是一不小心	/ 033
美男也薄命	/ 049
最后的生命之花	/ 067
归去来兮“迟”	/ 085
星光是怎样消退的	/ 113
1921 年的宿命	/ 131
青大记“闻”	/ 153
谁染霜林醉	/ 177
人生只在有无间	/ 201
在传闻逸事中永生	/ 219
三人行 双城记	/ 237
舞台·莲台	/ 261

在巴黎

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陈西滢《致志摩》

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北京奥运会那年的春天，对于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来说，可谓是一个真正的春天，而就在这个春天里，我这个不懂英语，更不懂法语，且从没想过要出国去、能出国去的乡巴佬，竟然一不小心随“中国出版代表团”人模人样地来到了巴黎，并凭借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住进了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住下后又人模人样地来到巴黎的大街上溜达，一会儿便溜达到了著名的丰特努瓦广场。

翻译指着广场边一座器宇轩昂的建筑告诉我说：“那就是法国海军司令部！”这让我突然间没出息地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火烧圆明园”，想起了我那位“饿死不如一匹马”的倒霉老乡叶名琛……正当我一时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中时，翻译又指着一旁另一座更加器宇轩昂的建筑说：“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一般人可能都知道，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纽约，却不知道其教科文组织总部却在巴黎，而我对此倒是早就知道，说来这都是因为一个人——想到此人，眼前似乎真看到了他似曾相识的背影——穿一件他常穿的白色西装，夹着一只公文包，其中等身材夹在人高马大、熊腰虎背的人群中显得另类而落寞，他就从我身边擦肩而去，走向那座器宇轩昂的大厦。

我不禁加快了脚步，尾随着他走了过去，最后竟也走进了大门。

门内原来还有一个庭院，面积不大，但放眼望去，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元素应有尽有。隔着庭院的对面，三座呈倒“Y”字形的大楼，如同一位巨人优雅地张开着两臂，欲拥抱每一个走进庭院的人；院内的草坪上，林立的各国旗杆簇拥着一个巨大的金属结构的地球；最显眼的要算其中的一块石碑，上面用多种语言刻着教科文组织《组织法》的第一句话：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我们也走进了庭院，只是他总是先我们一步；我见他绕过石碑，进入了大楼。我们也走进了大厅，迎面是几尊不同颜色的青铜人物雕像，分别代表着教育、科学、文化等；继续登堂入室，只见他最后竟走进了一个房间，成了墙壁上的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的下方有一行小字：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陈源。

我终于证实了，这个似曾相识的背影不是别人，正是他——陈源教授。

——他真的是躲到这儿来了！

二

陈源的确算是躲到这儿来的，因为他最初来这儿，多多少少有点在国内混不下去的意思。

何以“混不下去”？

今天的一般国人，知道陈源这个人都是早年从中学语文课本里，从其中鲁迅的那些文章里；不过那里面他的名字叫陈西滢。因此，一般人最容易想到他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原因便是他曾骂过鲁迅并被鲁迅骂过——两人相斗，其一是公认的“好人”，那另

一人必然是“坏人”；鲁迅既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那么与他相斗的陈西滢便自然是渺小的、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然而，陈西滢是1943年才出国的，鲁迅早在1936年就去世了——鲁迅在世时他都不怕、不躲，鲁迅去世后多年了，他反而“混不下去”要躲到国外去，这显然说不通。因此也可以说，陈西滢当年在国内多少有些“混不下去”或许是事实，但是其原因仅仅是骂过鲁迅和被鲁迅骂过，大体上也并非全是事实；至于说陈西滢的出国是因为红色的中国或中国的红色容不得他，那更说不通，因为新中国直到1949年才成立。

陈西滢出国的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而他却恰恰在这个时候出国，为此骂他的人曾说他是“躲避抗战”，但是他自己却解释说：

因对日战事孔亟，而英国方面乏人联络，获知陈源与彼邦名流有旧，乃设立中英文化协会，以陈源为会长……切实为双方作联系之工作。（转引自范玉吉《陈西滢文化心态初探》，见《江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陈西滢所说的大体上是事实，即他在国内“混不下去”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外族的入侵，使得偌大的中国已无处安放他一张安静读书的书桌了，以至于不得不“书生报国”。如此情形让我们不能不想到他的好友胡适，早在1938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时说过的一段话：

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我声明做官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1938年9月24日致江冬秀信》，见《胡适书信集 1934-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然而，胡适最终确实还是“回来”了，回到了校园，回到了图书馆，虽然那是在海峡的另一边。但是陈西滢却是一直不曾“回来”，既没回到重生后的祖国，也没回到海峡的那一边，可谓是一去不复返，直至终生，都只能“把他乡做故乡”！

三

陈西滢是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举荐而去英国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的。当初这很是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因为既接受了这一差事，便意味着陈西滢地地道道地“从政”了，而他原本是不愿意“从政”的。

陈西滢欣然接受差遣而事实上有违初衷地“从政”，这看起来是“陈源与彼邦名流有旧……切实为双方作联系之工作”这一客观原因，似乎使得此“会长”一职非他莫属，但是恐怕还另有一更重要原因：任职的去处不是别处，而是英国。

1896年陈西滢出生于江苏无锡，1912年，年仅十五岁就去英国留学，先入爱丁堡大学，后转伦敦大学，于1922年获博士学位。整整十年的英伦生活，其实陈西滢早已经将英国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在思想文化上，差不多就当作了故乡了。对于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是他当年一起留学的同学加好友，自然是最了解不过——或许也正是仅凭此一点，他才想到让陈西滢去英国担任这一职务。不仅如此，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

立后,王世杰为首任校长,陈西滢为文学院长,作为上下级同事,王世杰更了解陈西滢回国后,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生活等方面,在“教授”名义下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从被鲁迅痛斥到被大众抱怨,加上缠身的绯闻和夫人事实上几乎众所周知的红杏出墙,他的人生可谓是很狼狈很失败。这时候,对于陈西滢来说,没有什么比一次思想重温与文化还乡更好的安慰了;而此时陈西滢有机会回到英国,无异于就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思想重温与文化还乡——王世杰或许也正是凭这一点便坚信,一向宣称不“从政”的陈西滢一定会接受自己的举荐。

果然,陈西滢欣然接受了王世杰的举荐,出任“中英文化协会”会长,回到了英国——陈西滢的确是“回到”英国,因为那儿正是他头脑中自由主义思想与浑身上下所谓“绅士风度”(常被人骂作“臭架子”)的故乡。

陈西滢留学英国在十五岁到二十五岁间,这正好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这十年间,正好又是英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盛行的年代。所谓自由主义,即19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企图给政府和个人指定其各自的领域”,“自由主义分子,除了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外,都倾向于科学、功利与理性,反对激情,并且是一切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敌人”。“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所谓自由主义者,即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不属于一种固定的阶级,只凭自己的思想信念行事,信守理性、自由、公理等价值标准,维护社会的公正利益;而他们之所以公正,是因为他们始终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政治便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政治关系便是利害关系,离政治越近,就越失去社

会的公正与公理,也越失去自我,亦即越失去自由。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的土壤便是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有列强觊觎,内有军阀割据,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崇尚强权,社会混乱。陈西滢正是以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者,装着满脑子自由主义思想回到中国的,这便注定了他身上的文化气息与周围的空气格格不入,于是他的思想常遭误解与误读,他的言行更是常遭人非议与痛斥,以至最终他竟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四

我们今天读陈西滢当年跟鲁迅论战的文字,很容易读出一个尖酸刻薄的形象,甚至还有点桀骜不驯;且这个存在于他自己文字中的形象,与我们的想象也完全一致——一个敢于并且能够与鲁迅论战的人一定是这样的人。但是,据说实际生活中的陈西滢又几乎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并不善辞令,甚至有点木讷,即使在同仁好友的聚会中,他也常常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听众角色,只是偶到酒酣耳热之际,才会变得谈兴盎然。苏雪林不但赞其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还说他一双眼睛总是晶莹澄澈。即使是鲁迅在那些与陈西滢论战的文章中,也一直将他唤作“聪明人”“正人君子”,并且说他有着“一张中庸平和的脸”——当然这主要是讽刺陈西滢那注定行不通的自由主义主张和貌似公允、公正、公理的言行,但是也不能不与他平时的处世态度和为人风格别无关系。

有人以为,鲁迅与陈西滢的冲突是代表了当时东西方留学生两大阵营在围绕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时所必然发生的,

其实与他们各人的人品人格并无太大关系。今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留学生稍作文化反观,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留学东洋(日本)的与留学西洋(欧美)的,似乎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前者思想多“左倾”,后者多“右倾”;行为上前者多激进,后者多理性;政治色彩上前者多呈红色,后者更多呈灰色甚至黑色。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大体上说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本身的家庭出身不同,前者多来自于相对的“穷人”家庭,后者则多来自于“大户”人家。二是日本离中国的时空距离相对来说还算很近,留学期间与国内联系相对说来也还算紧密,自然对于国内社会的情况还算是相对了解;而留学欧美则是一去天边,几年、十几年不回是常事,与国内的联系几乎从此隔断,等到学成归国,实际上已对国内社会的认识产生隔膜。三是日本与中国不仅在地域、文化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的方面,尤其近代以来,与中国一样曾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其终于发展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这让中国留日学生看到了中国发展可借鉴之路;而欧美国家虽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则已是另一个发展阶段了。正因为这些原因,他们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问题时常常不约而同,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却又难免有冲突。今天,我们反观鲁迅与陈西滢的冲突,似乎确实如此。

其实,鲁迅与陈西滢之间并非水火不容,相反他们在有些方面竟有着相同的主张,他们都觉得当时的中国需要一场文化的启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才要“弃医从文”,此可谓众所周知;陈西滢则一直坚信学术可以救国,文化可以启蒙民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英国虽然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回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官本位”的国家后,并没有去“从政”,而是选择文化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在力劝胡适不要离开讲台

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在这方面的宣言：“只有一般专心学问的教授们以身作则，由人格感化，养成好学的学风，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闲话》，见《现代评论》1925年第3期）

然而，陈、鲁间的冲突终究还是难以避免地发生了。

五

陈西滢与鲁迅冲突的直接缘由，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

关于事件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大、中学校的教材上多有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但是我们今天若以稍稍公允一点的眼光来看，说陈西滢在事件中对学生的牺牲毫无同情，甚至是反动军阀的帮凶，似乎也言之太过。但是再看他的《西滢闲话》，且不说对于这样流血牺牲的事件，他竟当“闲话”来加以评说，这本身就失之轻佻，再看其中的一些言论：“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初看貌似公允，但是细看不难看出，他显然是端着个英国博士、北大教授的“臭架子”，只看到了学生运动对学校秩序的一种破坏，却看不到它是对反动势力的一种反抗。这也就意味着他的这种“公理”“公允”的态度，即使不是出于敌意，也是不合时宜的、错误的，遭到学生的反感也就自然而然。他还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横加指责，说他们发起的《七教员宣言》，是“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甚至含沙射影地进行人身攻击道，“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见《西滢闲话·粉刷毛厕》）。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惨遭屠杀后，在举国一片愤怒声中，他竟说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

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言下之意是她的死只是阴错阳差，实在不值。陈西滢的这些言论，岂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学生联名写信给陈西滢，在澄清事实的同时质问他，不要说什么正义了，就是起码的同情心都上哪儿去了！但是陈西滢还是死不认错，他不但把学生的信公开发表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上，而且仍坚持说，“‘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西滢闲话·杨德群女士事件》）。不过，据此我们倒也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都是他的“真心话”，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而且此言行本身也表现出他性格中确实不无单纯与书生气——既是我真实的思想，哪怕千夫所指、众人唾骂，我也要明确表达。或许这在他看来，也是一种绅士风度吧！

不过这样的绅士风度，最终因他无端地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之作等人身攻击而几乎尽失——作为好友，徐志摩赶紧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撰文，大呼“带住”，以免他更加豁边；而胡适多年后还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批评苏雪林沿用陈说，是对鲁迅没有根据的人身攻击，有失风度。

然而，对于风度已失、露出破绽的陈西滢，鲁迅岂肯“带住”！在鲁迅凌厉的攻势下，陈西滢最终只有败下阵来的份儿，最终成了鲁迅论战史上第一条被打落水中的“落水狗”，以至于从此以后“陈西滢”三个字几乎成了鲁迅论敌的代名词。

不过说陈西滢是“落水狗”也是有失夸张的。在与鲁迅的论战中，陈西滢并非始终处于被动挨打中——若他真是这样窝囊，作为对手的鲁迅也就显不出高明了；相反，在他们的论战中，陈西滢的“闲话”并不乏读者，有时甚至还不乏叫好者。

有人认为其文字生涯里仅凭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著名作家梁实秋说他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直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

明也明确说,“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再看一个事实,即在陈、鲁冲突事过十年后,鲁迅还借着《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出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胡适据此说“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这本身便不能说在与陈西滢的整个论战中,鲁迅也曾受伤,至少是留下了伤痛。因此说陈西滢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是两败俱伤,似乎也不为过。然而,尽管如此,陈西滢与鲁迅的这场论战,事实上既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思想和阵营方面的一个分水岭,也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他沿着自己的道路越走越远,回到英国,再转到法国,以至最终有家难归,客死他乡。

六

1945年,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起取得胜利,不久联合国成立,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在巴黎成

立,陈西滢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联合国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即今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在巴黎的陈西滢被人称作“陈源教授”或“陈代表”,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当年在《现代评论》上与鲁迅论战的陈西滢。

就在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一个房间里,有人告诉我,有一张高背的椅子是陈西滢当年最喜欢坐的。于是我似乎又看到了那斜靠在椅子上,微闭着双眼,歪叼着烟斗的陈源教授,他似乎永远都是那么一副静静地谛听的神态,只听别人在说,自己很少插话;有时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他们眼前的陈源教授“常驻代表”就是当年的“陈西滢”,竟当着他的面议论鲁迅对陈西滢的痛斥,本十分尴尬,但他仍不插话,只是聆听,就像在听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遥远的故事。此时的陈西滢,已完全沦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失败者——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失败者。

1949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成为历史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地位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而陈西滢在教科文组织中的地位也变得十分尴尬,有时可谓非常狼狈。时至20世纪50年代,台湾因岛内经济困难,当局一度无力支付每年近百万美金的联合国会费(按规定,凡会员国积欠会费在两年以上者,无投票表决权),为免除被褫夺投票权的处分,每次开会和表决,我们的陈源教授几乎沦落为四处拉票的政治掮客,甚至不择哄吓诈骗等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亦近绑架,回想起来也自觉可笑”,可谓毫无“绅士风度”,“正人君子”的脸面更是丢尽。然而,这一切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事终究说来就来了。

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的“驻法大使”随之降旗返台,但台湾当局仍电令陈西滢以“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名义驻馆看守。法国漫长严寒的冬季,更是陈西